

走向

台灣文學

葉石濤著



走向台灣文學

葉石濤／著

走向台灣文學

作 者：葉石濤

發行人：吳樹民

社 長：吳豐山

經 理：魏淑貞

責任編輯：游紫玲

校 對：葉石濤 姚文孝 陳貴妹

出 版：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 話：(02)3519621-438

郵 撥：0003180-1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四一五八號

法律顧問：蕭雄淋

印 刷：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第一版一刷：中華民國79年3月

*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 *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ISBN 957-596-043-2

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告白

—代序—

1

我生於民國十四年日據時代殖民統治下的古老府城台南。這一年，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當然剛生下不久的我，對這事一無所知。同時，我當然也不知道，這個時代是剛好民國九年發軔的台灣新文學運動逐漸進入佳境，脫離搖籃期，要跨入創作實踐爲主的開花期的轉折點。後來，我一輩子和台灣文學的各時代，各種不同運動直接或間接地有所接觸，這也許是跟我出生的時期冥冥之中有某種連繫的吧！

我這六十多年的生涯跨越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幼少年到青春初期是在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巨大陰影下受教育而長大的；而且我僅受過的高中教育也是在帝

國統治下，太平洋戰爭的戰鼓筋聲下完成。不僅如此，我也曾正式做過帝國二等兵，日本戰敗之後，以波茨坦一等兵退伍。所以直到我二十歲前後的生活，完全和現在六十多歲的日本老人的經歷沒有什麼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從小自覺自己是漢民族的一份子，我們的祖先來自唐山這一點上。至於有沒有濃厚的民族精神那就很難說了。我只知道，我好比是雙重人格的人，在學校，在社會的公開場合裡，必須講日本話，一舉一動都要像日本人一樣。回到家裡，我們又換了個人似的，把日本人的一切關在大門外，過著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說台語、拜公媽、去廟宇燒香，以及偶爾聽一些長輩所說的有關中國大陸的傳承和故事。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我們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我另一個生命的開始。雖然光復初期曾經遇到我這一輩子未曾看過的殘暴、荒蕪和摧殘，但是青春的生命是強韌的，我得以克服各種心理障礙，認清時代的趨向。一直勇往直前，上帝佑我，終能邁入現時的風燭殘年。

我這一輩子在國民黨執政中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長歲月，看到了許多不公不義，同時也看到了台灣從一個落後的農業為主的殖民地社會，進入富裕的消費社

會。社會上的不公不義可以由改革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來挽救，但是心靈上的空虛和荒蕪卻不能用任何豐裕的物質生活來填彌和補償。未來的台灣最重要的，毫無疑問的是人們心靈的再建構；唯有豐富而多元的思想教育才有助於提昇整體台灣人的心靈結構。

我這一輩子過著明暗兩種工作；明的工作是小學教師，一幹快要四十年了。這個工作施給我三餐溫飽，帶給我做尊嚴的人起碼的生存條件。很慚愧，做一個小學教師的我是乏善可陳的。這不是說，我是個只圖混口飯吃的壞教師，而是在這小學教育裡，我只是忠實平凡的教師而已。四十年來的小學教育環境不能和社會的進步相比。教師負擔之重，令教師個個猶如負荷過重的老牛一般，喘不出一口氣來。我現時六十五歲，每週擔任二十六節自然科學的課，還兼了其餘數不盡的額外行政工作。耐心早已磨消了，愛心幸虧還存在，想到天真可愛的孩子，每天非拖著精疲力竭的臭皮囊去上課不可。所以在明的工作裡，我只能做到盡責而已。但是我的潛意識倒能自由翱翔，時時刻刻在準備那另外一場打仗。

夜晚才是我真正打仗的時刻。我必須閱讀各種各樣的報刊雜誌以及新刊書籍，

還得振筆疾書寫出我內心裡醞釀的各種理性的喃喃私語或慷慨激昂的控訴，同時也要把溫熱的有關人類未來燦爛的夢想，對台灣文學發展的考察寫出來。這暗的工作帶給我的並不是快樂，而是更多的憂愁、悲傷和淚水。但是我竟然度過這樣漫漫長夜幾達四十多年，未曾沮喪過。從青春初期的日文轉移到中文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從拋棄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遺毒到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過程，從科學的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又是另外一個過程；總之，似乎有某種哲學思想的引導，我的心靈才會有了新的開竅。所以我這一篇信手拈來的回憶斷片，應該以我的文學思想的變遷為主題開展，另外輔以對我發生啟蒙作用的中外各文學家的說明。

2

我初次接觸真正文學作品，而不是安徒生或格林的童話，應該是考入台南州立二中的時候開始。這個高中是殖民政府為台灣人子弟專設的高中，在一百五十多個新生中，日本學生只佔三十幾個，其餘都是台灣南部各州（縣）最優秀的台灣人小秀才。至於是否跟全收日本人子弟的州立一中有什麼不同，這我可不太清楚。然

而，太平洋戰爭中的高中都採用軍事化管理這一點倒無疑義。不過，我願意說，學風倒是相當帶有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日本人師長中除去兩、三位極右派的神道主義者之外，其餘師長倒都和藹可親，民族歧視的情況並不多見；那時候，日本帝國已統治台灣四十多年，皇民化的奴化教育也相當奏效，台灣人的反抗意念也很微弱，所以倒能維持和諧的局面了。

我那時候的功課一團糟，每學期的成績都名列台灣人學生最末一個。而我下面全是日本人學生。這也沒什麼奇怪，在州立二中唸書的日本人學生大多數是較笨的學生，如果他們的成績好也就不至於來唸二中了。儘管如此，我們很少跟日本人學生發生衝突，一來他們是少數民族，二來他們也較天真吧。

我對於正經的功課沒有一點興趣，特別是數學，是我最大的敵人。常考鴨蛋不足為奇，是司空見慣的事。還好，日本的高中制度，只要全科平均達到六〇分就不留級，所以我就可以逍遙自在的整天啃我的閒書。

在課堂裡我也明目張膽的拿一些哲學的書來看，譬如黑格爾、康德以至於阿蘭（Alain 即 Emile Auguste Charier）、日本的小林秀雄等。如果說，我懂得他

們，那真是天大的笑話。只是陶醉於莫名其妙的白日夢罷了。不過啃這些深奧的唯心哲學也多少帶給我有關廣大的人類精神領域的知識，因而也窺伺了一些人類精神的複雜結構。除哲學以外，我也對人類考古學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我開始唸摩根的《古代社會》。這奠基了我認知社會科學的基礎，後來我由此出發，很容易地踏進恩格斯的世界。

不過這些社會科學和哲學的書缺乏有人指點，都在一知半解之中不了了之。除去年時的這一段，此外，我較少有充裕的時間去研讀哲學了。可能這些哲學和我天生的資質也有不契合的地方。我是個比較感性而富有情緒的人，浪漫的幻想多於嚴密的思考。我一輩子缺少知性和思想性是不可否認的。

離開了哲學以後，我的興趣轉移到文學方面。奇怪的是我所讀的盡是些法國文學和舊俄文學，至於英美文學，因為那時候英美是「敵性國家」的關係吧，抑或不合我的氣質，涉獵的範圍並不廣。我記得除迭更司、薩卡萊、高爾斯華綏、喬伊斯、馬克·杜溫以外，似乎讀得不多。但是法國文學就可觀了；從中世紀的「阿貝拉爾和耶洛伊茲」(Pierre Abélard)的書簡集一直到莫里雅克(Francois Mauriac)

等無所不讀；特別對史當達耳、左拉和巴爾扎克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我用布蘭德斯（George Brandes）的《十九世紀文學思潮》做指引，把這些小說找出來有系統地讀了一次。當然在吸收法國文學的過程中，我也觸及到舊俄文學和德國文學。除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杜思妥也夫斯基以外，諸如愛倫堡、蕭洛霍夫、岡察洛夫等作品也讀了不少。

由於日本人和德國納粹和義大利勾結，我們也很不情願地唸這些國家的文學；但是像赫曼·赫塞或韓斯·卡洛沙（Hans Carossa）或莫拉維亞的小說是不能以主義或意識形態來論定的。他們文學中的某種偉大品質的確也打動了我的心弦。除這些重要國家的作品之外。如卡夫卡或挪威的邊生（Bjornson）也偶爾有機會看到。有時候這小說世界也帶來了震驚和衝擊。

所以我高中五年級夜以繼日地讀了差不多在當時殖民地台灣所能買到的任何中外所有小說。當然是以日本文學為主，外國文學為輔了。很不幸這外國文學也包括許多中國文學。當時我們每週還得上一小時的漢文科。日本老師教的莫非是八出師表▽△李陵答蘇武書▽等之類符合忠孝節義的古文，其內容大多和古文觀止相同。

所以對中國古文學和典故我們也約略知道一些。大多數的日本人師長都有漢文的素養，這些中國的經典和歷史，他們也略知一二。我那時候，靠日文譯本看了中國文學的另外一個領域的白話小說；除《金瓶梅》之外，如《三國》、《水滸傳》、《西遊記》、《平妖傳》以至於《紅樓夢》都看過。甚至魯迅的《阿Q正傳》、郁達夫的《沉淪》都有日譯本。儘管我對於中國大陸的近、現代史不太明白，但是透過這有限的幾十本古代或三〇年代文學也可以想像大陸的一些社會情況了。老實說，透過這有限的幾本中國現代文學去了解複雜的大陸政治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些文學啟示的世界，卻不是一部分知識淺陋的日本人惡意的侮蔑那樣——落後而野蠻的。起碼我認識了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也像台灣知識份子一樣富於懷疑性和思考性，他們對人類的福祉和未來遠景有深刻的關懷。

我之所以能夠讀我心愛的書，而不需為生活煩惱，那是拜我出生在一個小地主之家的福氣。日據時代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台灣人都是農民，而且都是佃農。可是佃農比起沒錢租田地耕稼的農民而言，他們的生活是更高一級的。在這樣大多數三餐不繼的赤貧中，我卻能飽食而搜羅世界名著隨心所欲地閱讀，過較優雅的生活，這

全是宿命。如果我生在佃農之家，至今仍是個目不識丁的老農，這是殆無疑義的。

讀小說太多的結果顯而易見，我就覺得技癢了，於是開始模仿我心愛的作家寫起小說來。我並不喜歡日本近代文學主流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我較喜歡故事性強，富於幻想，個性和氣質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浪漫主義文學。我第一次寫的小說叫做《征台譚》，是以獨白的形式描寫明鄭三代的故事。這是我看了荷蘭最後一任台灣太守揆一的《被遺忘的台灣》而構思的。當時的台灣有兩本純文學雜誌，其一是日人作家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其二是台灣作家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當然都是清一色的日文雜誌。我把稿子投到《文藝台灣》去，倒不是看上它是日本作家爲主的雜誌，而是那雜誌的耽美和浪漫的格調頗符合我的胃口的關係。至於《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的批判性風格我則覺得缺少情趣，格調太暗澹了些。當然，可想而知，我這「偉大」的處女作，永遠被打入冷宮了。作品沒登出來，但是我倒結識了這位《文藝台灣》主編，早稻田大學法國文學系畢業的詩人作家西川滿先生。作品沒登出來，心有不甘，我再接再厲寫了一篇中篇小說《媽祖祭》投到《台灣文學》去；這一次倒有了反應，作品雖然未曾刊出來，可也入了選，還有人執

筆批評得體無完膚。那時候著實憤慨得罵盡了人家祖宗八代呢。如今，重讀當時不知誰所執筆的這短評，覺得正是一針見血，字字擊中了要害，可見閱歷不深的作家應該虛心接受長者的訓誡才是。我所寫的第三篇小說是△林君寄來的信▽，這是模仿法國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的短篇寫的。此次又投給△文藝台灣▽去了。這一次西川滿先生格外開恩，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刊登在△文藝台灣▽。那時我才十八歲，小說刊登的那一個月，我好不容易從台南州立二中畢了業，應邀到台北，當西川先生「文藝台灣社」的編輯去了。同一年七月，我又寫了一篇小說△春怨▽這也刊在△文藝台灣▽上的。這一次模仿的並不是都德而是紀德(André Gide)的△窄門▽。我在西川先生家學到了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那便是作家要認真生活，刻苦過日，孜孜不倦地寫到死。簡言之，作家必須是人道主義者，奉獻和獻身是作家唯一的報酬。西川先生雖然屬於統治階級，少不了有民族優越感的一份高傲，他的文學是耽美而浪漫的，但是對文學的執著和奉獻精神卻是有值得人稱道的地方。不過，後來，我的文學思想逐漸改變由浪漫的藝術至上主義走向批判的寫實主義，所以我對他的外地文學的主張——即把台灣文學看做是日本文學的延長這一點上有

所懷疑，而且日本殖民政府有計畫徵收滿二十歲的台灣青年去服兵役。所以辭掉這一份對我心靈有絕大啟蒙作用的工作返回府城台南去了。

我在台北這一段時間最大的收穫莫過於認識了台灣文學苦難的歷史，並且結交了許多位可敬的台灣先輩作家。張文環、楊逵、吳濁流、呂赫若、龍瑛宗各位先生都是當時有幸認識的幾位作家。特別是跟龍瑛宗先生的交往給我帶來豐富的教益。光復後有一段時期，龍先生主編《中華日報》日文版的時候，我跟他來往最密切。他的現代人的懷疑精神和銳利的知性一向是我所欽佩的。

返回台南以後，我毫無困難的在一所小學找到助教的位置，當起小學教師來。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日軍敗戰之徵愈來愈明顯的時刻，我接到日本軍部發來的乙紙徵兵令，到大目降（新化）即楊達的故鄉的一所日本軍營報到。即日起變成和尚頭，穿起軍服，當起帝國二等兵來。雖然只是個二等兵，但是由於是部隊長和小隊（排）長的勤務兵的關係，我倒是趾高氣揚的。日本軍隊階級之別森嚴無比，但是我既是部隊長的勤務兵，誰也得罪不起我。我照樣在軍營裡讀我的小說和閒書，我記得當時讀的是盧拿兒（Jules Renard）的《紅蘿蔔》和法布爾（Henri Fabre）的

《昆蟲記》。有時候心血來潮也會去軍營的糧食倉庫要來砂糖，拿去外面雜貨舖換香煙抽，從此，我這一輩子和香煙結了不解之緣。砂糖雖然是部隊長喝紅茶時要放的，但我揩油了不少。那時候，物質匱乏，一斤糖可說是稀世珍寶了。日本軍營生活的嚴苛和殘暴舉世無雙，但我很少看見日本士兵刻意虐待台灣兵。這是日本軍部通令各部隊嚴格禁止虐待台灣籍士兵的關係。台灣兵中還有一部分是完全不懂日本話的。語言不溝通常惹起糾紛，脫營逃亡之事屢見不鮮。民族和民族之間的敵意是沒那麼容易消弭的。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從日本軍營獲得解放，揹著一個大麻袋，裡面裝滿了日本軍隊所發給的軍服、鞋子、糧食、罐頭之類的東西，搭乘火車回鄉。那一年是幾十年來罕見的大豪雨，從新市到台南這一段路火車不通，我是完全靠走路回家的。汗流浹背地返回府城時，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掌燈時分了。

3

光復後的一段初期，台灣民衆對於祖國的熱情的昂揚是舉世無雙的。可惜，在

這台灣歷史裡最重要的轉折點裡國民黨政府一再犯了很大的錯誤。當然在戰爭剛結束的那個大混亂裏，對台灣情況的不了解以及千頭萬緒亟待處理的迫切事情太多，政府無暇顧及台灣也是可以了解的。然而派了一個惡名昭彰的舊軍閥陳儀來治理台灣，絕對是不可原諒的錯誤。關於這一段令人傷痛的時代我不願再勾起回憶，淚水早已流乾，血跡已蕩然無存，無數台灣精英份子從此從台灣的歷史舞台黯然消失。我僥倖逃過劫難，算是天大的福氣，我不想在這兒，縷縷細述，那仇恨交加，互相敵視，埋下台灣幾十年來衝突和激盪的禍根。

儘管在這樣荒蕪的日子裏，台灣的知識份子和來台的大陸開明知識份子曾互相提攜，想挽救狂瀾。但都無濟於事，都全面潰滅。那時候的台灣知識份子都從來沒對中國大陸失望過，他們都夢想，有一天富強的新中國終於會建立起來，光耀世界。他們辦許多報刊雜誌致力於介紹大陸的歷史，典章文物制度、政治和文化，特別注重介紹現代中國文學，力求台灣民衆和大陸民衆之間的心靈溝通。如果說，在二二八事變前後，台灣民衆已經有分離主義的思想，那是昧於歷史現實的胡扯。甚至二二八事變這慘重的悲劇發生以後，台灣民衆仍然並未停止對祖國濃厚的愛，

這一點，我是過來人，也勇於做見證人。

光復初期的台灣知識份子最大的心理癥結，並非現時的統獨之爭，而是馬克思主義的蔓延。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之所以發生並非沒有根據的。從民國三十九年三月開始國民黨政府展開了既深且廣的恐怖政策，幾乎把當時的所有頭角嶄嶄的知識份子中的精英，包括外省人的進步份子在內，一網打盡投入集中營裡去。被捕的台灣民衆份子比較複雜，有目不識丁的農民和勞工、小商人在內。這大肅清自然也把無辜的人打入地獄裡去。

日據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除一小撮的屬於大地主階級的政治領導份子以外，大多數爲了抵抗日本法西斯，不得不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武裝自己。這是台灣日據時代解放運動中不可缺少的思想原動力。光復後的社會凋敝的悲慘現實環境正好提供了極好的溫床。所以光復初期的台灣青年知識份子，絕沒有分離主義的傾向，倒有左傾思想卻是事實。我記得學生間開讀書會的組織極其普遍，有些較前進的已經效法俄羅斯的民粹主義，打入農村和工廠裡去，展開了宣傳與組織。後來我研究這一段歷史而且在獄中仔細考察之結果，他們已經發展了有個雛型的組織系統；分別由